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总主编

周向军
傅永军

李春明 著

全球化与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

山东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总主编

周向军
傅永军

副主编(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春明、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李春明、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按姓氏笔画为序)李春明、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李春明、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李春明

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李春明 著

全球化与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

李春明、张其成

李春明、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张其成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总主编

周向军

傅永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李春明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4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丛书/周向军,傅永军主编)

ISBN 978-7-5607-3827-7

I. 全…

II. 李…

III. 政治—文化—研究—中国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0285号

善 即 香 李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20×1010毫米 1/16 19.25印张 268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山东大学出版社

总序

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特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是当今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渗透最深的社会现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众多学者开始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研究全球化问题，他们形成的共识是：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不断跨越本国、本民族的空间障碍和社会障碍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始于经济方面，然后又及社会生活及文化诸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多种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开启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文化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文化的全球整合，也意味着文化的冲突。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产生了积极影响，又带来了负面效应；既提供了良好机遇，又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因素而又消除其消极影响，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而又不丧失机遇，从而进一步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实践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有鉴于此，2002年，由周向军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招标的

当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项目编号:02JAZJD710003)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对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课题的系统研究。之后,这个研究课题又成为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设项目,并被纳入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得到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山东大学)资助。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团队的研究人员分别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当代中国跨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换”、“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问题。我们期望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对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作用在全面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作出更加符合客观实际的、令人信服的科学说明。

第二,对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对类似是否存在“文化全球化”这样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有深度的说明。

第三,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的机遇与挑战,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刻的说明。

第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回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对策方面,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我国国情出发,就若干突出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和主张。

我们期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实现我们预设的目标。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各部著作的作者多为年轻学者,他们思维敏捷,创新意识强,有锐气和朝气;但作为成长中的学者,他们同时也有着学术功力尚欠火候,学术积累尚欠深厚,学术洞察力尚欠深邃,学术思考尚欠全面等不足,因而收入本丛书的各部著作,也会因为这些缺欠而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恳请专



家、学者和读者提出批评指正。但无论如何,收入本丛书的各部著作都是每位作者的用心之作,它们代表了参与本项目研究的所有学者现阶段关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问题的阶段性思考。我们希望这些思考能够发挥抛砖引玉之作用。

本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研究的带有标志性的阶段性成果。丛书出版后,我们将广泛听取多方意见,继续加强研究,力争拿出新的、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最终成果。

最后,借丛书出版之际,向所有为关心、支持本丛书写作与出版的各方人士表示感谢,特别感谢那些为本课题研究以及本丛书出版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的单位、机构。

周向军 傅永军

2009年3月22日于泉城济南

目 录

0341)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第四章
0341)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一
0341)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二
0341)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三
0380)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第五章
0380)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一
0380)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二
引 言		(1)
0381)	淮安登报的精英政治文化发展研究	第六章
一、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		(1)
二、国内学术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现状综述 (1994~2008年)		(7)
三、本研究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创新价值		(25)
第一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		(29)
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全球化动力		(31)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挑战		(42)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理性态度		(49)
第二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观的理性建构		(58)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两种政治文化发展观评析		(58)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观的具体建构		(73)
第三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		(84)
一、发展生产力型政治文化		(85)
二、发展民主型政治文化		(103)
三、发展法治型政治文化		(126)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安排	(143)
一、生产力型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安排	(143)
二、民主型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安排	(154)
三、法治型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安排	(173)
第五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着力点	(189)
一、政治认同的获得与维持	(189)
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建设	(206)
第六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代价及其调控	(221)
一、政治文化发展的成本投入性代价	(222)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代价	(231)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代价的调控	(240)
第七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	(252)
一、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领导主体	(252)
二、知识分子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探索主体	(266)
三、中产阶级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兴实践主体	(277)
结 语	(289)
参考文献	(291)
后 记	(298)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我国恢复政治学学科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方兴未艾。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不论是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应该在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处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临全球化态势,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并以此为契机,推动自身的发展和创新,构建既适应中国现实,又面向全球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试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问题,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期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研究,略尽微薄之力。

一、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美国。首倡者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其后便成为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阿尔蒙德 1956 年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阐述政治文化时指出,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决定政治活动取向的特殊模式中,这种特定的模式

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①并把这种态度和倾向进一步分为政治认识性成分、政治情感性成分和政治评价性成分,强调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②。直到1987年,他还认为:“政治文化是由认识上的、感情上的和价值上的因素组成的。它包括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意见,包括对政治和价值的价值观念的情感。”^③政治文化的另一著名研究者路辛·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观领域,它规范政治制度,确定人们的政治行为。^④锡尼·维巴则指出,政治文化不是政治制度和机构,也不是政治行为模式,“它不是指正在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指人们对这些事情所抱的信念”^⑤。

由此可见,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主要从社会心理方面来研究政治文化的,他们把政治文化视为描述社会文化与政治活动关系的一个范畴,它揭示的是一定社会文化对政治体系和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它主要通过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来体现,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长期作用于人们而形成的基本一致的社会心理。

而前苏联学者则强调政治文化的阶级性。他们认为,强调政治文化是主体的心理动因、主观的态度,尽管也包含着个别正确的因素,“但它们终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因为它们都忽视了阶级和阶级利益问题,忽视了社会的政治生活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所决定的”^⑥。他们强调政治文化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因此,

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②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③ [美]G·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黎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

④ 转引自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⑤ 转引自[美]道森《政治文化》,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12期。

⑥ [苏]B. JI. 安德鲁先科:《精神文化与人》,罗长海等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政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这种政治思想体系在体现阶级利益的政党纲领中被具体化了,成为实际指导政治体系建设和运行的重要力量。由此他们认为,政治文化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或层次:反映阶级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并在实践上予以实现(基础的层次);政治知识和见解的总和(信息的层次);政治知识变成信念(价值的层次);公民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参加国家管理(实践层次);政治思想物质化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和传统,固定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制度(规范方面)。^①

1980年前后,我国恢复了政治学学科,学者们也开始了政治文化的研究。学者们尝试着将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分析和阐述政治文化,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收获。综观我国学者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宏观化的政治文化定义。即认为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而且还包括政治理论及政治制度。如孙正甲认为,政治文化的界定,“一般可解释为政治体系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意识形态的可操作领域,其中,前一领域可涵容政治心理、政治价值、政治意识等含强烈政治色彩的精神要素;而后一领域则可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行为、政治表达方式等政治范畴”^②;万高认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系统结构,包括实体性政治文化和观念性政治文化。实体性政治文化是以政治文化转化形态出现的政治制度……观念性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③

第二类是中观的政治文化定义。主张将政治文化视作与实体政治制度相对的观念性的东西,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与价值的综合。例如徐大同先生认为:“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

^① 参见[苏]H·凯捷洛夫《社会利益与政治文化》,于洪君译,载《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4期。

^② 孙正甲:《政治文化模式分析》,载《理论探讨》1990年第4期。

^③ 万高:《简论“政治文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政治学》1995年第2期。



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王沪宁先生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具体地说，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王惠岩先生认为：“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非理性的情感认识因素，也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性认识因素。即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因素，同时还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①另外，戚珩先生认为，政治文化“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政治理论、政治意识，二是以感情、习俗等表现的政治心理，三是在上述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政治价值及判断”^②。

第三类是微观的政治文化定义。基本上赞成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如孙西克倾向于“接受国际政治学界对政治文化概念的限定，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加以研究”^③。马庆钰认为：“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制度中产生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的观念依托。”^④

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对政治文化概念内涵的理解，都把社会政治心理作为政治文化的内容，这是他们的共同点，理解的分歧点在于政治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该不该也看作政治文化的内容。主张把政治制度作为政治文化内容的学者，显然受到了文化学界对文化内容分类的影响，在文化学界，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可以分为观念性文化和实体性文化。实体性文化是指承载和体现着一系列文化观念的制度体系，而观念性文化则包括思想意识、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笔者认为，不应该把政

① 转引自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载《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② 戚珩：《政治文化结构剖析》，载《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

③ 孙西克：《政治文化与政策选择》，载《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

④ 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的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治制度作为政治文化的内容,这是因为,虽然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物质载体”,体现着一系列的政治文化价值,但是它毕竟不是政治文化本身。而且,这样一来,未免使政治文化的概念泛化,使政治文化研究和一般的政治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不能突出政治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因此,不宜把政治制度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

关于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是否是政治文化的内容,笔者倾向于把它们作为政治文化的内容。正如前苏联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政治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它首先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而其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因为无论个体的认识情感、愿望要求、社会风俗、民族传统还是思想理论观点,都是社会的精神范畴,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运行发展的结果,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上,反映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的。因此,前苏联学者对美国学者政治文化观的批评是合理的。一味强调政治文化中的心理动因、个体主观方面,是不全面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多地强调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在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如果这样,就不能从动态过程来观察公民与政治体系的相互关系,也容易走向片面性。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把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加以研究,又要把政治文化作为“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来研究。因此,笔者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是中观层次的政治文化定义,即把政治文化作为与实体的政治制度相对立的政治观念体系,包括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与价值的综合。

关于政治文化的发展,阿尔蒙德通过对政治文化的变化过程的研究,提出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主张,他明确地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视为衡量政治文化发展的尺度。他从系统分析的三个层次来分别考察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一般性意义:首先,在体系层面上,“世俗化代表性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

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①。其次,在过程层面上,“世俗化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总的说来,世俗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②。再次,在政策层面上,世俗化是人们对政策的观念,它包含着“把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③。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笔者认为也应该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有了世俗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社会需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发展有了强劲的经济基础,铸就了政治文化世俗化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对此,吴忠民教授分析认为:第一,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成员的现实性追求。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看重经济利益问题,于是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来看,已改变了以前的那种只注重高远的目标,代之以务实性的态度,即注重目标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从社会成员具体的行为取向来看,已改变了以往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注重日常生活,注重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注重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这是加速我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有利的社会土壤。第二,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成员理性化的行为取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宽容、秩序、稳定、渐进的观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在探索我国政治发展道路问题上更强调适合中国国情,而不再是追求那种浮躁的、缺乏根基的所谓“民主制度”。在民主政治理念的引导下,人们也不再以某种想象中的超凡魅力来评价领导人,开始习惯从政府运作的效率和政治权威的领导能力来作评判。第三,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诉求。市场经济体制所蕴涵的平等与自主的

①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②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③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精神、现代知识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普及,容易使社会成员培育出一种自主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与能力。^①

上述市场经济体制所导致的人们的现实性、理性化、参与性,符合政治文化世俗化发展的要求,也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发展造就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也应该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是,这样的目标模式未免过于笼统。笔者认为,应该把世俗化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化。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社会成员现实性的心理需求以及“世俗化代表性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②的要求,我们应该发展一种“生产力型政治文化”;根据政治文化世俗化在政治过程体系和政策体系方面的要求,以及“它是扬弃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民主化与法理化的政治文化”^③的要求,我们应该着力发展“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总之,在世俗化大的发展趋向向下,我们应该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具体化为:“生产力型政治文化”、“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法治型政治文化”。笔者将对这三种政治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内涵、内容、发展原则等具体问题展开探讨。

二、国内学术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现状综述(1994~2008年)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结1994年到2008年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展开:

① 参见吴忠民、赵慧珠《世俗化:含义、标线、隐忧》,载《理论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

②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策略》,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③ 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40页。

(一)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背景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背景的认识,政治文化研究学者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1. 关于国内背景的研究。对于政治文化发展的国内背景,学者们着眼于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学者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与我国当前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我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期,亦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的方式向集约型增长的方式,从“人治”型管理方式向“法治”型管理方式转变。^①相应地,学者们也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国内背景称之为“转型期”、“现代化过程中”、“改革”等等。例如,吕元礼先生在其《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中,探讨转型的国内环境以及转型的内容,占了该书将近一半的内容。吕元礼先生把改革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国内背景。他指出:革命与改革,是社会变革的两种基本类型。在我国,1949年以前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社会变革,是一场革命;今天,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各项体制和具体制度的变革,则是一场改革。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在革命成功之后,由领导革命的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今天,如何适应改革的新形势,对革命时期产生、培育的政治文化加以转型与创新,是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成功的重大课题。^②

另一方面,有学者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环境出发,把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国内背景。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治意识等现代政治文化发展要素生成和发展的土壤,等等。例如,刘剑君、徐勇认为,市场经济既对原有的

^① 参见李琪《论社会转型期的公共行政:参与、整合与后置》,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参见吕元礼《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政治文化秩序产生了冲击,导致了政治文化的短暂迷乱,同时又刺激过渡性政治文化结构的产生。新型的、能够经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文化观念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中得以诞生的。尽管原有的政治文化要经受“概念兑换”和“要素更新”,但是,这一趋向印证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只有不依赖于某种情感力量的驾驭和浪漫主义的刺激,而依赖于现实的物质力量的驱动时,才算踏上了一条成熟、稳健之路。^①

再一方面,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国内学术界也把和谐社会构建作为政治文化发展的国内背景,在这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例如,有学者指出,和谐社会是和谐政治文化构建的终极目标。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政治文化来支撑。社会要和谐,文化是灵魂,政治文化更是导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政治关系的和谐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政治关系的和谐是各种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的和谐是政治关系和谐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政治文化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重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②

2. 关于国际背景的研究。大致从 2001 年开始,随着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加入 WTO,学者们把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自觉置于全球化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诸如“入世”、“网络化”的国际环境中,从而拓宽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研究视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据笔者从中国期刊网的搜索,自 2001 年以来,学者们直接以“全球化”为国际背景来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或者以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入世”、“网络化”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国际背景。例如,马庆钰先生认为“全球化”是“人类文化现代化的推进器”^③，“入世”是“政治文化发展

^① 参见刘剑君、徐勇《市场经济与政治文化论纲》,载《新东方》1997年第5期。

^② 参见张恺《论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③ 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的分析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2 页。